

# 改革开放 30 年德育理论发展脉络探析

叶飞 檀传宝

**摘要：**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德育理论发展经历了理论研究的复苏期、理论基础的建构期、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期，以及德育理论的多元与争鸣期四个主要阶段。今后，德育理论的多元与争鸣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主体间性德育理论、生活德育理论、情感德育理论、德育美学观、公民德育理论、后现代德育理论、生命德育理论、体验式德育理论、德育专业化理论等将继续深化发展，公民道德教育理论将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文化与德育的研究将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寻求国家间的对话与理解将成为一段时期内德育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向。

**关键词：**改革开放；道德教育；德育理论

自 1978 年拨乱反正以来，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逐渐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复苏，中间经历了多次理论上的转折和起伏，最终形成了目前的德育理论发展态势。对于改革开放 30 年来德育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1）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历史梳理可拓宽我们的理论视野，并且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2）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历史梳理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性指导；（3）从社会与德育的关系来分析，历史梳理可使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与德育之间的关系，提高德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4）从德育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历史梳理是德育理论反思自身、提升自我的一个契机。

本文主要通过通过对 1978 年至 2008 年公开出版的德育理论著作进行文献分析，辅以对相关的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的整理，以此为基础，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德育理论发展进行阶段的划分，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特征。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更清晰地把握德育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为今后的德育理论研究提供一种基于历史的展望。

## 一、1978—1983 年：德育理论研究的复苏

1966—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同时也是教育学学术研究的灾难。“在一片打倒声中，在一片砸烂声中，在一片斗争、批判声中，教育学在劫难逃！”<sup>[1]</sup>学校教育的阶级化和政治化不断升温，教育最终被彻底地政治化和帮派化了。<sup>[2]</sup>在这场大灾难中，知识分子被当做牛鬼蛇神一律打倒，学校德育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德育理论研究也在混乱中基本消失。“在这样一个政治形势之下，学校德育完全被政治宣传、政治运动取代，德育科学研究当然也没有了存在、发展的可能。”<sup>[3]</sup>直到 1978 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学校教育和德育工作才逐渐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毁弃的德

育理论研究也才有了复苏的趋势。所以，1978—1983年可以称为德育理论研究的复苏期。

第一，这一时期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德育政策的拨乱反正。“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德育，有的只是阶级斗争和政治宣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种德育方式得到了深刻的反思，拨乱反正的工作也逐渐进入德育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当时，学校德育的拨乱反正工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1）德育理论界展开了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团伙的批判，反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宣传为唯一目的的学校德育政策。王炳照在当时曾指出：“‘四人帮’高喊极‘左’的口号，推行极右路线，表面上十分重视德育，实际上他们对学校教育中的德育破坏最为严重。”<sup>[4]</sup>（2）对德育工作重新定位，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德育几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批德育理论工作者重新思考德育的地位。吴庆桑、陈子茂指出，必须把德育摆在领先地位，因为德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sup>[5]</sup>另外，一些文献也反映出当时很多一线教师已经认识到了德育的重要性，认为学校德育工作应该得到加强。<sup>[6]</sup>随着这种批判与反思在学界的开展，德育理论研究也呈现出了复苏的态势。

第二，诸多学者展开了对古代德育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文化成为打、砸、抢、烧的对象。“破四旧”、“批林批孔”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过后，传统文化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德育传统也被抛弃得无影无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德育理论工作者自发地开始了文化“寻根”之旅，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德育价值，开始了对古代德育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工作，从而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作品，如毛礼锐的《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1980）、王炳照的《批判继承古代道德教育思想遗产》（1984）、张惠芬的《教育史中的批判与继承》（1980）、宋惠昌的《关于道德的继承性的几个问题》（1980），等等。这一批德育理论研究的成果旨在重新评价古代德育与现代德育的关系，把传统德育作为一个可供利用的资源来加以批判与继承，从而促进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三，对德育思想的分析、梳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大量的人文知识分子、自然科学家、教育家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多方的摧残与虐待。一些教育家的思想被贬得一无是处，孔子、孟子等先哲们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以及改革开放的契机，德育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展开了对德育思想的梳理，以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当时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有李惠成的《试谈“学记”德育的方法论》（1983）、卢曲元的《试谈毛泽东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1982）、陈景磐的《论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1980）、李道仁的《学习马克思的德育思想》（1983）、周德昌的《孔子德育思想简论》（1981），等等。对德育思想的梳理，使得诸多的德育思想、德育理论精华得到了继承，这对于德育理论的发展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促进了德育理论研究的恢复和发展。

## 二、1984—1989年：德育理论的基础建构

通过拨乱反正，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违背德育规律、德育阶级斗争化等做法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这不仅促进了德育理论研究的复苏，同时也为下一阶段的德育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1984年起，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进入了德育理论的基础建构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心工作是德育寻求一个可靠的根基，以促进德育研究的科学化、合理化。当时的德育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对德育的社会基础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德育理论研究者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德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这一方面是有感于社会的整体变革给德育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德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深刻反思，重新认识社会之于德育的基础性地位。鲁洁在《商品经济与教育》（1989）中指出，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教育的观念和意识也必然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一系列的变化。”<sup>[7]</sup>所以，德育理论研究不可能对这种社会的、经济的影响视而不见。关于社会与德育的关系的探讨，这一时期相关的研究还有班华的《德育要适应培养创造型人才的要求》（1986）、胡晓莺的《学校德育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9）、欧阳茂森的《试论改革中的道德评价与道德教育》（1986）、刘献君的《试论学校德育和社会大系统》（1986）、张耀灿的《改革与道德教育》（1986）、刘海生的《论历史转折中的学校德育》（1988），等等。这些研究成为当时德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德育理论的发展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第二，对德育心理基础的研究。德育心理研究一直是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德育研究的科学化、合理化。事实上，从赫尔巴特开始，教育理论就一直在寻求自身的科学化之路。<sup>[8]</sup>赫尔巴特试图把科学化的理想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从而使教育道德教育研究走向科学化。在我国，德育理论的科学化取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忽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德育研究的恢复，一批德育理论工作者重新开始了品德心理的研究，期望在心理学中寻找德育的规律，实现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确定性。当时的主要理论成果有陈会昌的《论德育心理学的方法》（1984）、萧楸的《论德育过程的心理模式》（1983）、陈安福的《德育心理学》（1987）、韩进之等的《德育心理学概论》（1986）、潘菽的《教育心理学》（1983），等等。

第三，对德育自身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对德育地位、德育本质、德育内容、德育过程等的研究。关于德育地位，有的学者强调德育在“三育”中的领先地位。<sup>[9]</sup>赵翰章认为，德育在学校教育中应居于重要地位。<sup>[10]</sup>有的学者则强调，对于德育地位的分析不能采取孤立的方法，而应该结合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进行分析。<sup>[11]</sup>总体来说，德育的重要性在当时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关于德育本质，当时也有诸多的探讨。胡守棻认为，德育的本质就是教育者把一定社会思想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sup>[12]</sup>李道仁也指出，德育的本质即教育者将社会提出的思想言行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人品德的矛盾运动过程。<sup>[13]</sup>可见，这一时期关于德育本质的研究，偏重于社会规范的“转化”，还没有注意到

道德的自主建构。对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过程等，当时也有不少分析。胡守棻主编的《德育原理》（1989）指出，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在人的思想品德方面的总体规格要求；德育的基本内容包括文明行为习惯培养、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德育过程是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社会的思想和道德规范的过程。李意如、胡筠若则认为，学校德育要培养起具有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人；德育的内容应包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等。<sup>[4]</sup>这一时期关于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德育过程的研究，偏重于德育的政治功能，对于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还没有达到像今天这样的重视程度。

### 三、1990—1999 年：德育学科的分化与整合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以及 80 年代中后期的恢复发展之后，德育理论研究在 90 年代初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规模。德育学科开始向内部展开深入挖掘，并且向学科外部拓展，在不断分化的同时又形成了理论上的综合、整合趋势。根据这些特征，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德育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时期。

#### （一）德育学科的分化趋势

在这一时期，从“德育原理”这一母学科中分化出来的子学科非常之多，子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到了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价值、德育过程、德育管理等方面。比如：探讨德育过程的德育过程论、分析德育方法的德育方法论、研究德育教学的德育教学论、探讨德育价值的德育价值论、研究学校德育管理的德育管理理论，以及对中西方德育进行比较研究的比较德育学，等等。德育学科分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围绕着德育研究的一系列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兴起，比如：德育与艺术学交叉产生了《德育艺术论》（1998），德育与心理学交叉产生了《品德心理研究新进展》（1999）、《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1999）、《德育学科教学心理研究》（1998），德育与美学交叉产生了《德育美学观》（1996），德育与环境学交叉产生了《德育环境学》（1992），德育与社会学交叉产生了《德育社会学》（1998），德育与管理学交叉产生了《高校德育管理学》（1995），等等。学科分化拓宽了德育研究的视野，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科界限模糊、重复研究、学科偏见、学科封闭，等等。总体来说，学科分化的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只是“德育学”这一学科，其他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分化趋势。

#### （二）德育学科的整合趋势

在这一时期，与德育理论研究的分化趋势并存的还有另外一种显著的趋势，即德育学科的整合趋势。德育理论研究在不断趋于分化和专门化的同时，也在对自身进行整合和综合。德育理论研究的这种内在矛盾和张力在其他学科中也普遍存在，比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也同样面临着学科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德育理论研究的综合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围绕着学校德育的理论与实践而产生的一批

综合性德育理论研究著作，如屠关雄的《德育理论与实践》（1992）、李长喜的《德育理论与实践》（1992）、施修华的《德育学理论与实践》（1994），等等；二是通过对于德育基本理论的探讨所产生的综合性德育基本理论著作，如古人伏的《德育学教程》（1993）、仇春霖的《德育原理》（1993）、刘惊铎等的《德育学教程》（1994）、储培君的《德育论》（1997）、戚万学和杜时忠的《现代德育论》（1997）、胡厚福的《德育学原理》（1997）、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1998），等等；三是综合了德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而产生的一批德育理论研究成果，如胡守棻的《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一体化》（1992）、缪克成的《德育新论》（1992）、周之良的《德育新论》（1994）、李善奎的《德育良鉴》（1992），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是德育理论研究走向综合化的一个标志，它们为德育学科的整合、综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德育学科的分化与整合是这一时期共存的两大趋势，相信这两种趋势的共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将影响中国德育理论的发展。

#### 四、2000—2008 年：德育理论研究的多元与争鸣

进入 21 世纪以后，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争鸣化的新趋势。这种多元与争鸣主要表现为大一统的德育理论走向了消逝，各种德育思潮、德育流派兴起，中西德育思想在冲突、碰撞中走向融合，德育理论在指导实践的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新的理论。德育理论研究的多元与争鸣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1）德育理论研究经过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恢复和发展，已经积淀了比较深厚和稳固的基础，这就为多元与争鸣提供了条件；（2）中西方德育思想一直处于冲突、碰撞和交融的状态当中，随着大量的、多样性的西方德育思想、德育理论的流入，我国德育理论研究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种多元化的趋势；（3）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文化危机导致各种文化思潮的兴起，这也直接影响了德育理论流派的产生与交替；（4）德育理论工作者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发挥出了极大的理论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直接推动了德育理论的繁荣和多元发展。总结这一时期的德育理论研究成果，以下一些德育理论思潮是我们注意的。

1. 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德育理论。主体性德育理论认为，“道德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主、自觉、自愿、自律的行为。”<sup>[15]</sup>只有通过主体性道德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而“无视学生个体主体性的道德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大多数都表现为缺乏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性”<sup>[16]</sup>。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主体性德育理论虽然有其意义，但也有缺陷，因为它“未能走出个性主义的窠臼，把学生看成单子式个体，忽略了‘共识’、‘主体间性’的本体论意义。”<sup>[17]</sup>所以，在主体性德育理论之后，德育理论研究又出现了一个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的趋势，主体间性、交往理性、商谈伦理由此得到了更多德育理论研究者的青睐。

2.生活德育理论。生活德育理论是在批判传统的知性德育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生活德育理论认为,知性德育导致了德育与生活的割裂,它“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割裂了人性、德性,割裂了德育与生活的联系,因而体现出割裂的特征。”<sup>[18]</sup>这种割裂无法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基于此种分析,一批学者共同提出了生活德育理论试图使道德教育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生活德育“是一种新的德育模式,是对以往和现行的以分裂、知性和技术化管理为特征的德育范式的转换与超越。”<sup>[19]</sup>生活德育理论的此种超越,确实让人们看到了变革的曙光。直至目前为止,生活德育理论不仅影响了德育理论界,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学校德育的实践,影响了德育新课程标准的制定。

3.德育美学观。德育美学观主要是针对我国德育长期形成的功利主义症状所提出的一种德育理论。面对长期以来的功利主义德育取向,“德育现实不仅呼唤德育理论提供新式武器,而且呼唤德育理论提供精神营养。”<sup>[20]</sup>德育美学观的提出,就是要通过德育的审美化、可欣赏化给予德育以精神滋养。德育美学观通过将德育与审美相结合,通过德育形式的美、德育内容的美、德育过程的美等来促使整个德育过程成为一个充满美感的过程,使德育成为可欣赏、可体验的美的享受。从德育美学观的理论设想来看,它对于解除现代德育的功利主义病症无疑是一剂适宜的良药。

4.情感德育理论。情感德育理论认为,道德情感是一个人道德发展的基石,“道德情感在个体道德的大厦中,直接参与道德认识、行为、品质、评价、信念的活动,它本身就是个体道德的主要存在方式,是全部道德现实化的根本环节。”<sup>[21]</sup>所以一旦道德情感这座大厦不牢固,那么,个体的道德发展也就失去了稳固的根基。正是基于此,情感德育理论主张,学校德育应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为出发点,通过情感陶冶、情感关怀、情感体验等方式来进行道德教育,促进学生道德品质的生成和发展。

5.制度德育理论。制度德育理论认为,当前的学校德育正处于实效性低下的困境当中,要从困境中走出来,有两点是必须做好的:(1)社会制度本身要体现公平和正义,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2)学校德育不能回避对于道德制度本身的德性考察,要不断去完善自身的道德规范和制度体系,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人。<sup>[22]</sup>在制度德育理论看来,我们的学校德育建设在制度方面是有欠缺的,制度不完善、不合理、缺乏人道精神等都降低了学校制度的有效性和德性,而“要改变这种现状以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加强学校德育制度建设是一项有力的举措”<sup>[23]</sup>。正因为如此,制度德育理论试图建构一种德性的学校德育制度,从而消解学校德育中的积弊。

6.公民教育理论。公民教育理论的提出是与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政治领域的变革,尤其是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为中国公民教育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空间。”<sup>[24]</sup>我国正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由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公民教育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适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公民教育理论所提出的培养理性、独立、自主、合格的社会公民的德育目标,对于道德

教育的发展以及公民个体的成长无疑都是有益的。从我国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公民教育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合乎我们社会的发展需要的。

7.德育文化研究。德育文化研究主要是将德育置于整体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分析探索。“德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文化的形态。”<sup>[25]</sup>正因为如此，德育文化研究把德育提升到了文化层面，试图通过文化来准确地把握住德育的内涵。概括地说，德育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领域有传统文化及其德育意义的研究，现代文化中的文化多元、文化冲突及其对德育影响的研究，信息时代的媒体文化、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等对于学校德育所提出的挑战的研究，等等。德育文化研究使道德教育回归了文化的根性，这对于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8.后现代德育理论。后现代德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后现代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后现代德育理论一方面对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等有所警惕；另一方面又对其所倡导的主体性、交互性、宽容性等具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后现代德育理论在当前一个代表性的研究主题是后现代消费主义、媒体文化与学校德育的研究。后现代德育理论通过分析消费主义和大众传播文化所引起的学校德育问题，为当前我们的德育理论研究贡献了不少具有创造性的观点和见解。它为解决后工业时代的德育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方法和策略。

9.生命德育理论。生命德育理论认为，在多元社会中，人类的生命意识正在凸显，道德教育观应该从机械论转向生命论，更加贴近学生的生命世界。“学校道德教育必须从远离学生生命的格局中走出来，回归学生的真实生活，关注学生的生命世界。”<sup>[26]</sup>而当前的道德教育之所以不能进入学生的心灵深处，“其根本原因是它忽视了学生心灵的体悟、情感的激发、生命之间的交流。”<sup>[27]</sup>所以，道德教育应该去接近学生的生命，关心学生的生命，最终促进学生的生命成长。

10.体验式德育理论。体验式德育理论认为，知识德育模式遗忘了生活世界，遗忘了鲜活的道德体验，从而丧失了自身的活力和实效性。因此，当前的道德教育有必要在批判知识德育的基础上，倡导一种道德体验论：“道德体验论将教育者改称为‘导引者’，受教育者改称为‘体验者’，凸显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情境性和生成性，从体验活动和体验课程的融合上展开实践探索。”<sup>[28]</sup>这正是体验式德育理论的主要理论旨趣。

11.德育的专业化理论。德育专业化理论认为，德育教师的专业化和教师的德育专业化在当前的学校德育中显得尤为重要。要想实现这两个专业化，必须注意好三个方面：（1）德育不仅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同时也是一项教育任务。所以，所有教师都需要参与德育工作，不仅仅是德育教师。（2）要建立对所有教师的德育素养专业标准，从而保证所有教师在德育的专业性上都能达标。（3）对狭义德育教师的专业标准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因为狭义的德育教师主要从事的就是德育工作，所以标准应设得比普通教师高一些。<sup>[29]</sup>通过建立这些专业标准，学校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师的德育素养，最终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的德育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经历了恢复与发展、分化与整合

以及多元与争鸣等几个不同的时期。这几个时期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主要是出于理论分析的需要。通过对德育理论发展脉络的历史梳理，我们对今后的德育理论研究可以形成这样一些展望：（1）德育理论的多元与争鸣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主体间性德育理论、生活德育理论、情感德育理论、德育美学观、公民德育理论、后现代德育理论、生命德育理论、体验式德育理论、德育专业化理论将继续深化发展；（2）伴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展开，公民道德教育理论将成为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3）全球范围内文化多元、文化冲突的加剧，将促使文化与德育的研究成为今后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4）德育理论研究愈来愈呈现出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的道德问题，因而寻求国家间的对话与理解将成为一段时期内德育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向。

### 参考文献：

- [1]郑金洲，瞿葆奎.中国教育百年[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86.
- [2]杨东平.艰难的日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185-186.
- [3]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41.
- [4]王炳照.“四人帮”“批智育第一”是对德育智育的全面破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3）.
- [5]吴庆燊，陈子茂.必须把德育摆在领先地位[J].学术论坛，1983，（6）.
- [6]衡阳县第一中学党支部.工作重点转移，德育更要加强[J].湖南教育，1979，（4）.
- [7]鲁洁.商品经济与教育[J].江苏高教，1989，（1）.
- [8]唐莹.元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47-48.
- [9]吴庆燊，陈子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摆正德育的重要地位[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1985，（1）.
- [10]赵翰章.德育论[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25.
- [11]德育原理编写组.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37.
- [12]胡守棻.德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6.
- [13]李道仁.德育本质问题的探讨[J].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6）.
- [14]李意如，胡筠若.学校德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25.
- [15]王如才.主体体验：创新教育的德育原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80.
- [16]肖川.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7.
- [17]彭未名.交往德育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43.
- [18]高德胜.知性德育及其超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03.
- [19]高德胜.生活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89.
- [20]檀传宝.德育美学观[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35.
- [21]朱小蔓.情感德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0.

- [22]杜时忠.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2, (1) .
- [23]刘天娥.制度: 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有力杠杆[J].中国教育学刊, 2007, (3) .
- [24]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57.
- [25]王仕民.德育文化论[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7.48.
- [26]刘慧, 朱小蔓.多元社会中学校道德教育: 关注学生个体生命世界[J].教育研究, 2001, (9) .
- [27]刘济良.生命体验: 道德教育的意蕴所在[J].教育研究, 2006, (1) .
- [28]刘惊铎.体验: 道德教育的本体[J].教育研究, 2003, (2) .
- [29]檀传宝.德育教师的专业化和教师的德育专业化[J].教育研究, 2007, (4) .

###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Ye Fei & Tan Chuanbao

**Abstracts:** In the past 3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four major stages in terms of stage of recovery, stage of theoretical basis construction, stage of disciplinary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stage of diversity and debate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From now on, the trend of diversity and debate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will develop continually; the moral education theory of inter-subjectiveness, life moral education theory, emo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ory, moral education aesthetics outlook, citizenship moral education theory, post-modern moral education theory, life moral education theory, experience type mo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the specializ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y, etc.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eir development; citizenship moral education theory will become an emphasis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cultural and moral education research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for mor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o pursue the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ly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trend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theory

**Authors:** Ye Fei, doctoral candidate at College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Tan Chuanbao, Dean,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Research Center for Citizenship and Moral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作者简介:** 叶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檀传宝,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5)